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课题



在我党的历史上，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独立领导的又一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课题组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课题组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邓小平与百色起义》课题组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19-05043-7

I. 邓... II. 邓... III. 邓小平(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1866 号

总 策 划 江 淳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白竹林

责任校对 陈红燕

封面设计 黄爽亮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课题组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8. 375 印张 220 千字

广西南宁大板彩印有限

责任公司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5043-7/D·705

定价: 30.00 元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编委会

主 任	马 飏			
副主任	梁炳巨	徐念农	邓 群	
编 委	黄植勉	向济萍	师小玲	莫亚人
	周敏琼	马祥茜	孔文青	梁玉珍
主 编	邓 群			
副主编	姚 蓝	韦秀康	卢 桦	陈柳青
撰稿人	邓 群	姚 蓝	韦秀康	卢 桦
	陈柳青	盘福东	梁韶玫	宋安玲

序 一



广西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4年8月22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同年12月11日是百色起义75周年纪念日。在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喜庆日子即将到来的前夕，《邓小平与百色起义》一书出版发行，这是广西党史研究工作值得庆贺的大事，也将是献给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百色起义75周年纪念的一份珍贵礼物。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一书文笔流畅，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在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与百色起义革命实践的历史渊源关系的同时，发掘和总结了长期埋在文件堆里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起义的重要思想——党的兵运工作策略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关分化瓦解敌军、创建工农红军（人民军队）、实行工农兵总联合革命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完整的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共广西地方史研究的空白。该书的撰写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论从史出”、“历史发展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百色起义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在拓展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上下工夫，刻苦研究中共中央1921年至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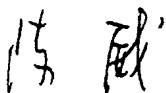
年形成的一系列文件，既吸取了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又不局限于现有的成果；既尊重已经形成的结论，又提出新的命题；既史论结合，又论从史出；既不囿于“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微观方法，又能运用历史纵深和空间纵横的宏观方法，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根据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以及军阀战争被革命战争所代替的必然性，鸟瞰百色起义的全过程，挖掘出意想不到的新的思想内容，取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重大理论价值的新成果。

该书紧扣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关键问题——“六大”中央逐步形成和成熟了的兵运工作策略理论，客观阐述了邓小平怎样运用这套理论贯穿于百色起义革命实践之中，回答了百色起义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思想、为什么百色起义以兵运工作理论为指导思想的问题。对百色起义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和为什么作出了科学回答，凸现了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又一次影响十分深远的伟大起义。百色起义的兵运工作经验和教训，对全国的“兵变”、“将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提出了邓小平是中共从事兵运工作的光辉典范这个鲜明的结论。课题意义深远，研究颇见功力，结论客观科学，得到学术界许多同仁的赞赏和认同。

该书是近期研究广西地区党史的最新成果之一，注意将党史研究与服务现实相结合，许多符合时代脉搏的新颖思想跃然纸上，令人耳目一新，它为我们重新审视百色起义的革命精神及其伟大的光荣历史，为进一步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基础性理论。但是，理论与学术研究是不断发展和永无止境的。该书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有待于完善，但它对中共党史和中共广西地方史研究的贡献却是积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贡献将进一步展现。

2004年2月

序 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和区党委宣传部、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的一批科研人员，通过深入研究百色起义的材料和中央当时的一系列文件推出的一部力作。本书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囿于狭小的范围，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以及军阀战争必然被革命战争所取代的高度，抓住时代脉搏，把研究历史与服务现实结合起来，许多新颖的构思跃然纸上，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这部专著，全面阐述了“邓小平与百色起义的关系”，论证了“百色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关系”，说明了“邓小平是中共从事兵运工作的光辉典范”和“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理论上的创造性及其革命实践”。这些命题紧扣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六大”中央逐步形成的兵运工作策略理论，和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革命实践中对这一策略理论的运用，从而回答了为什么百色起义以兵运工作理论为指导思想和邓小平是中共从事兵运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作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和广西人，我为家乡本书课题组的同行坚持唯物史观，坚持“论从史出”，坚持“发展与逻辑统一”的

研究原则和方法，努力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取得的成果而受到教育和激励。诚然，本书也难免存在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妇女运动研究不足等问题，但瑕不掩瑜。它对中共广西地方史研究的贡献，将展现在读者面前。

2003年11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一	沈北海 (1)
序 二	陈 威 (3)
第一章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1)
第二章 百色起义的指导思想	(38)
第三章 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在百色起义中的成功实践	(58)
第四章 邓小平是中共从事兵运工作的光辉典范	(71)
第五章 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理论上的创造性及其 革命实践	(86)
第六章 右江革命根据地几项重大建设工作与 民族政策的实施	(121)
第七章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32)
第八章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和“分耕”制 的本质	(143)
第九章 邓小平文化工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59)
第十章 红七军北上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述略	(173)
第十一章 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 20 年 (1929—1949)	(184)
第十二章 邓小平在百色起义中的任职考述	(199)
第十三章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研究综述	(203)
第十四章 百色起义概述	(220)
第十五章 继承和发扬百色起义革命精神 加快 广西经济发展步伐	(239)
附录 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大事记	(246)
后 记	(257)

第一章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

一、导 论

在我党的历史上，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独立领导的又一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这一伟大壮举，强烈地震撼了西南半壁的反动统治，壮大了革命力量，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的优秀骨干，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次起义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百色起义的历史意义

199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同志在纪念百色起义7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央的讲话，给予了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邓小平同志是百色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起义斗争中表现了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正确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坚决排除‘左’的错误的干扰，科学地制定斗争策略；大力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充分相信和依靠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创造了革命斗争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改造并掌握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周密的准备，于

1929年12月11日，胜利地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创建了拥有18个县、100多万人口的全国瞩目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领导和发动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两次起义的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形成了广西武装起义的高潮。邓小平同志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中所建树的伟大功绩，像一座丰碑矗立在人民心中。江泽民同志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江泽民同志的话，充分表达了亿万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无限崇敬之情。”

百色起义不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它是工农群众和士兵联合起来的革命总暴动。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吸取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吸取了秋收起义成功的经验，奋起斗争，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坚决执行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同时又坚决执行“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政治口号，引导了这次革命起义行动。

2. 百色起义前的军阀混战形势

1929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后，蒋、桂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争一触即发。由于桂系新军阀内部出现胡宗铎、陶钧与李明瑞的矛盾，实质上还是李宗仁、白崇禧与李明瑞的矛盾，在蒋系军队自安徽、江西两省沿江地区西上进逼的形势下，李明瑞执掌桂系军队第三路代总指挥职责，乘机将桂系军三分之二的实力调集到安全地区，提出反对新军阀的口号，联蒋倒戈反桂，桂系在武汉地区的军事实力，顷刻间全部瓦解。蒋介石在5月中旬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国民革命军编遣特派员回桂主政。5月底，李明瑞从上海率军乘船经粤港转回梧州、桂平、南宁，6月在南宁建立了俞作柏、李明瑞广西政权。李明瑞

与俞作豫是表兄弟关系，俞作豫又早在蒋桂战争爆发前，接受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偕同魏柏冈等一批共产党员秘密潜入李明瑞第十五师做兵运工作。李明瑞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左派军人。此次联蒋倒戈反桂成功回桂主政，途经香港时，又通过共产党员陈勉恕、俞作豫的关系，向中共中央表示了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的意思。此时中共中央对蒋、桂军阀战争的态度和政策，就是要对军阀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使交战双方军阀都失败，发展壮大群众运动，取得工农暴动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因势利导，分别从上海、福建、广东各地派遣邓小平、张云逸（自上海）和陈豪人（自福建）、何世昌（自广东）、龚鹤村（后叛变）、龚饮冰、许进、许卓、冯达飞、徐冠英、叶季壮、袁任远、李谦等40余名共产党员，进入俞、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

3. 百色起义是兵运工作的起点和最好的切入点

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之所以一次派出40余名得力干部到南宁进行兵运工作，是基于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和秋收起义成功的经验的总结，认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动地到来，它必须依据历史形势的分析和估量，作出准确的判断，制定相应的策略。1928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六大”后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必是各种斗争的总汇合（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士兵反军官斗争等），所以我们目前战略上的任务，是要同时促进各种斗争的发展，尤其要注意各种斗争相互的联系，相互的促进而汇合成为一个总的高潮。”^①中共中央还指出，不要对军阀战争采取等待其来临的机会

主义态度，尤其是将来的蒋桂两系的战争，以他们现在准备的形势，必将要形成长期混战的局面。蒋桂两系异常的奸猾，他们准备不充分决不轻易发动战争，所以党的任务要从现在开始加紧群众工作，领导各种斗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我们在军阀战争爆发时，实现领导群众推翻军阀统治的任务。假如我们平时不发动各种斗争，群众力量没有充分的强大的基础，军阀战争一旦来临，便要陷于盲动主义的错误^②。

192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指出，蒋桂两系战争，是军阀混战和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矛盾的焦点。认为：目前全国形势中，是两个阶级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也即蒋系大军阀与桂系地方军阀及其他小派军阀间的冲突，各派地方军阀完全要依附在蒋桂两大派之下而不能独立。如广东陈铭枢要反对李济深，就要投降蒋系之下；江西王均要反对朱培德，便要投向桂系之下。即便是冯阎的冲突，也要选择联蒋或联桂^③。这就点明了桂系地方军阀在诸地方军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与蒋系问鼎中原的能力。既然党的政策对军阀战争双方采取“失败主义”态度，这样，就可以利用蒋桂矛盾，选择其薄弱的一环作为工农武装暴动的出发点和切入点。桂系这股地方封建军阀势力，在蒋桂战争失败后，力量逐步瓦解，正是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

4. 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首先指向买办封建阶级

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现时中国革命，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这不是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参加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不过，资产阶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满足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劣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是一方面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

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左右，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另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资产阶级）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这样从发展动态的角度上来分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调摇性，与1925年12月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分析是一致的，但中央的分析较之毛泽东的分析更明白、更完备、更符合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证明资产阶级主体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按：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没有大资产阶级的称谓，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北伐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代表，篡夺北伐胜利果实，举起屠刀“右手打倒共产党”，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因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发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宣布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民族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成员。指出：中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现状，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④。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充分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屠杀工农的反革命本性，指出：中国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是最不能负起历史上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

……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逸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些事实很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溃的景象。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竟然在短时间内变成一个反动的政府党。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有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历史条件下，抛弃国民党旗帜，抛弃资产阶级于民族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之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革命策略逻辑的统一。当然，此时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中还有可以团结的对象，是策略不够灵活的缺点。

于是，“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以前是能够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1927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了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动力，现在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⑤。这在中国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主要的派别，无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将其动摇妥协劣根性扩大发展起来，成为革命的敌人，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

1928年2月，蒋桂冯阎四大派新军阀形成暂时妥协的所谓团结。4月，四派军阀兵分四路围攻奉系张作霖。6月攻下北京、天津以后，这种团结立即涣散，形成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前者要“统一”，后者要维护地方封建军阀地盘割据，正在酝酿战争。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今天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

争。

军阀各派之间酝酿的战争，蒋系抛出“反桂系是革命战争”，桂系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蒋系就是为革命的利益”。双方都宣称“将来的战争是革命战争”。面对新军阀混战的局面，1929年3月15日，中共的《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明确地指出，现在所说的军阀战争与过去北洋军阀时代的战争不同，过去表现为中国封建势力内部的分裂。现在则表现为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发展的冲突，但是它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表现，已经不是单纯的旧时封建势力内部的斗争、单纯的军阀抢夺地盘的斗争，而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通告点明蒋介石系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各自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他们争夺市场、争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⑥。虽然蒋系桂系各自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界线分明，但是双方的力量组合却不是清一色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接着提请全党清醒地认识军阀混战的复杂性：阎锡山、朱培德、陈调元等，虽是明显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当然带一些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他们在政治关系上可以不依附于代表封建地主的桂系，而可依靠于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这仍不妨碍他们做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在将来爆发蒋桂战争（这是中共中央3月15日的预言，果然3月28日便爆发了），在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方面，一定要团结不少封建势力。这并不是（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去消灭封建势力，却是民族资产阶级将要妥协一部分封建势力去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到了4月上旬，蒋桂战争已趋公开化，蒋介石以阴谋手段分化瓦解了桂系封建势力，对桂系封建势力的俞作柏、李明瑞妥协，使之反戈倒桂，去进攻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这股主体部分的封建势力。但要注意，即使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系胜利了，也不会消灭桂系的封建势力，仍然需要与封建势力结盟，形成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专政。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蒋桂战争以蒋系的胜利收场后，4月10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指出：蒋介石已经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桂系在武汉的势力已经失败，蒋介石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在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比重加大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如“资产阶级又重新左倾起来”、“重新起革命的作用”的错误论调又有所抬头，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又增长了一些，这就给革命增加了一些困难。而桂系失败的原因，是蒋系利用了桂系内部的矛盾，使其军队分裂，桂系在武汉前线的代总指挥李明瑞反戈倒桂，也就是蒋系对李明瑞这一部分封建势力，作出妥协，又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使桂系的军事力量，在北方京津和南方武汉顷刻溃败、更加孤立^⑦。中共中央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阀混战对工农革命武装暴动的重大影响，为此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对军阀战争的策略理论，开始提出，中国工农革命除了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准备武装暴动，还必须有军阀军队的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士兵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⑧。

中共中央从1928年3月到11月，在许多文件中反复强调破坏军阀军队，并在其中进行兵运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组织认识到，只有争取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投入到工农革命中来；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28年9月18日，《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开始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和“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两个口号，要求工农群众从现在起就渐次团结在两个口号之下，然后到了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才能使这两个口号变为群众的直接行动的口号，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必须是各种斗争的总会合。我们目前战略上的任务，是同时促进各种斗争的发展，尤其要注意各种斗争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会合成为一个总的高潮。